

马克思生态世界观的现代意义

——“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国际会议”综述^{*}

郭剑仁, 鲁绍臣

(复旦大学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D [文章编号] 0257-2826(2011)05-0089-04

2010年11月17—18日, 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创新基地、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联合主办的“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国际会议”在复旦大学召开。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俞吾金教授到会致辞, 并阐发了在当前开展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国际研讨的重要性。来自美国、中国台湾和大陆的约四十位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一、中国学者提出“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范畴

自20世纪60、70年代环境问题引起全世界关注以来, “马克思是否有生态思想”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内外激起热烈的争论, 大体上有三种回答: (1) 马克思思想是反生态的; (2) 马克思的思想有积极的生态思想因素, 但不够系统, 且没有理论化; (3) 马克思思想本质上是生态的。

复旦大学陈学明教授指出, 在“发展技术、经济非物质化”、“自然市场化、资本化”和“道德、伦理改革”等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措施不同程度失效后, 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所引出的生态世界观是当今世界唯一能指引人们消除生态危机, 建设生态文明的思想武器。在他看来, 《1844年经济

学哲学手稿》所体现的马克思生态世界观的一个重要方面是: 揭示了私有财产制度与自然相对立的普遍性。只有通过生产者联合起来才能消除劳动异化、人与自然关系异化和自然异化的社会, 这就是共产主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 共产主义不仅是一个人道社会主义的社会, 而且是一个自然主义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在赞美资本主义征服自然力的同时, 也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城乡的分离和对立, 以及与之相伴的人口集中及大多数人口相对贫困等生态问题。因此, 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的一些核心理念实际上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形成: 所有生态问题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起的。

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新陈代谢”和“新陈代谢断裂”理论在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借助“新陈代谢”, 马克思把他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以下三个方面的批判联结在一起: 对直接生产者的剩余产品剥削的批判、对资本主义地租理论的批判, 以及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批判。这一理论直接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研究引入到社会与自然关系领域, 正是这一理论研究预示着许多当今的生态思想, 这也正是马克思生态世界观的核心之所在。

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

^{*} 该文得到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创新基地基金项目资助, 特此致谢!

的：(1)“应然”层面，即从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角度论述理想社会应该是怎样的；(2)“实然”层面，即资本主义是如何现实地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的。在“实然”层面上，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告诉我们：资本的本性和逻辑是现实的生态危机、环境问题的最终根源。在“应然”层面上，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告诉我们：消除生态危机就是一场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

美国《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简称CNS)期刊主编乔尔·柯维尔(Joel Kovel)在他的论文《马克思和生态学》中呼应了陈学明教授关于马克思思想中存在生态世界观的主张。柯维尔强调，我们应该在 worldview 高度和世界历史意义层面上揭示生态危机根源和寻求解决生态危机之道，实现文明形态的转换；而不只是斤斤计较于具体技术的、管理的和法律上的解决办法，也不是孜孜以求地去澄清环境生态责任和义务。

柯维尔认为，马克思对当时的环境问题做出了深刻的观察和研究，即资本积累是生态危机的最终根源。资本主义把资本积累看作是高于一切的目标，在追逐这个目标的时候，量的生产支配了质的生产，交换价值支配了使用价值，工业化成为资本主义破坏自然的手段；自然被简化，成为满足人类的需要和愿望的对象。从历史上看，这一切的实现又是以直接生产者失去对生产条件的控制并与之分离为前提的。因此，解决生态问题的方式就是扬弃资本主义制度。

柯维尔随后提出自然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概念。他把自然的内在价值的特征描述为：既不可能单独存在，没了它却又是无意义的，在一定限度内它可以被理解为精神存在维度的敞开。内在价值与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区别在于：内在价值根本不与生产相关。内在价值的原则是：保护世界的整体性，反对把世界割裂成各个部分。把自然的内在价值与马克思的使用价值、价值结合成一个三角关系去分析资本，这才是扬弃资本的逻辑之道。

清华大学韩立新教授依据日本学者岛崎隆的说法，认为马克思定义的劳动过程具有双重逻辑：(1)“目的实现”逻辑，即体现为“人以自身

的行为来中介、调整和控制”的行为；(2)“物质代谢”逻辑，即体现在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过程中。韩立新教授分析了与“目的实现”相关的“对自然的支配”观念，指出马克思是在如下两点意义上赞成“对自然的支配”的：(1)它决不是类似于主奴关系那样的“绝对的支配”；(2)它不单是一个按照自然规律合理地利用自然的问题。更重要的，它还是一个如何克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批判”问题。

韩立新教授指出，在对第二逻辑的分析中，马克思在两重含义上使用“物质代谢”：第一重含义指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物质代谢，在这重意义上，马克思是在生理学和生态学的意义上来使用。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生产和消费只是由动植物和无机界组成的“巨大的循环”的一个环节。第二重意义指劳动过程意义，即用物质代谢来定义劳动过程。在分析第二重意义时，韩立新教授借用了亚里士多德(也被施密特)使用的“形式”和“质料”两个范畴。劳动赋予质料的是相对于质料自身固有的内在形式而言的外在形式。这种形式的转换体现了人的主体力量，然而质料本身对劳动赋予给它的外在形式是漠不关心的，劳动赋予质料的外在形式迟早要被瓦解，质料要求回归它固有的内在形式。

二、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 深化与经验的反思

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为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从可持续发展视角深入分析“我们为什么没有能够做得更好”，以及我们需要在未来几年中如何去做。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王雨辰教授指出，把生态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实际上是一种严重误读。事实上，生态马克思主义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对具有后现代性质的西方绿色思潮展开批判的结果。王雨辰教授分析了生态中心论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区别。在他看来，生态中心论把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归结为人类价值观的危机，因此，生态中心论解决生态危

机的出路在于确立生物道德价值观,此外生态中心论是反对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的。

与生态中心论不同,王雨辰教授指出,生态马克思主义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来探讨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及解决途径的。在制度层面,生态马克思主义把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看作是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哲学价值观维度,生态马克思主义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意蕴,展开技术批判和消费主义价值观批判;在政治维度上,生态马克思主义主张破除资本主义制度和全球权力关系,实现人类生态价值观变革,主张把生态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有机结合起来,主张实现生产决策和管理过程的民主化、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王雨辰教授指出,这三个维度是辩证统一的整体,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建构是哲学理论基础,制度批判维度是核心,政治维度是理论归宿,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生态文明理论的建构提供了理论资源,本质上是现代主义的生态理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郭剑仁副教授分别考察了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潮代表人物本·阿格尔、詹姆斯·奥康纳、约翰·B·福斯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他指出,阿格尔的理论前提——“无限地对商品的需要与有限的地球物质之间的冲突引发生态危机”——在逻辑上是不充足的,而阿格尔的方法论即理论与实践的辩证法是实证的、狭隘的。因此,阿格尔的生态马克思主义不能说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奥康纳由于对“自然”和“文化”作了非历史主义的独断理解,对“国家”进行了非阶级的分析,因此,奥康纳自己所称之的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不能说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福斯特坚持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坚持了阶级分析方法,建构了生态唯物主义哲学和“物质变换断裂”理论,用以综合地批判资本主义对自然、社会和人的掠夺与剥削,可以说是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是还不够系统和明晰。

在经验研究方面,北京大学邹庆治教授认为,中国在取得应对2008—2009年经济危机的巨大成就后,在经济和环境方面也付出了巨大代价,诸如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扭曲发展的房地产业和

继续加重的生态环境压力等问题。他指出,从可持续发展的更高更长远目标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深层次难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反而在某种程序上加重或突出了。对于后危机时代的中国而言,从大局着眼,我们必须花大力气充实完善经济、社会和生态复杂综合体中的社会发展与生态和谐,追求一种经济、社会与生态之间更加协调的发展。否则,我们至多会实现一个美国式的大众消费社会,果真如此的话,中国的未来不可能是一个社会公正与生态可持续的社会。他强调指出,这样一种深刻的绿色转型绝不应该仅仅发生或局限在国家层面上。

台湾铭传大学吴惠巧副教授以中国台湾资源环境条件和1949年以降的经济发展为背景,从“人”、“地”、“事”三个角度讨论了台湾环境问题的起因,揭示了台湾环境问题的主要表现,讨论了台湾民众生态思维的特点和重点:追求资源之永续利用;保护环境敏感地区;确保生态互利共生;维护生物多样性。她还揭示了中国台湾地区环境维护与经济成长之间的“两难”:一方面是肇因于工业和科技的环境质量低落,另一方面是对经济和科技的憧憬。

山西省农科院潘幸来研究员从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能量循环角度,分析了中国古今农业在物、力、术三个方面的问题,即物化技术资本量少质劣、物质生产能力低而不稳和科学技术贫乏简陋。以此为基础,提出“永续生态农业”的概念。潘幸来研究员指出,在遵从自然和社会经济的基本定律的基础上,只有实现农业新技术革命,在法制、经济和伦理道德三大社会调节杠杆的协同下,才能最终实现中国符合生态的新农村建设目标。

三、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本次会议有关这个主题的讨论涉及的内容丰富、理论性强,比如讨论了生态文明的理论内容、原则及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关系,生态文明与现代性、发展等问题的关系。

弗莱德·麦格道夫(Fed Magdoff)是佛莱蒙特州立大学植物和土壤科学家,同时又是政治经济学学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次会议中,麦格道夫从自然科学的生态学和马克思主义角度讨论了生态文明建设中应该坚持的立场和原则。麦格道夫首先指出一个问题,即“为什么我们对生态系统的了解越多,我们毁坏环境的步伐却加快了呢?”麦格道夫认为,这是资本主义造成的。

麦格道夫指出,生态系统自身具有自我更新的弹性能力,而维持强生态系统如森林生态系统的关键是自然的土壤—植物—动物的各种层级的联系应该是持续的。从物质循环和能量循环角度看,人口在城乡之间的分离和远距离贸易等人类生产和消费活动产生的结果就是中断或改变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各种层级的联系,这倾向于弱化和恶化生态系统,使之效用减少,自我更新的弹性能力减弱。

麦格道夫还指出,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的、社会的物质变换出现了马克思所发现的不可修复的断裂。这种断裂在20世纪非但没有修复,而且越来越严重,因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弥补断裂的措施,如施用人工合成肥料来补充土壤营养等措施,只会招致更大的生态和环境问题。不止如此,麦格道夫还揭示出20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下的另一个导致物质变换断裂的新因素,即由于肉牛、家禽和肉猪的资本主义式的集中饲养和屠宰,更加深了全球范围内的物质变换的断裂。

麦格道夫认为,生态文明社会应是一个与自然系统和谐而不是超越和控制自然的社会丰富的多样性;借助密切相联的物质变换关系实现高效的自然循环、自足、自我调节,基于自我更新的自发修复。这些自然的强生态系统的特征可以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形态值得借鉴或应该遵守的原则,当然,这些原则是作为地球生物圈之子系统的人类社会组织。麦格道夫认为,未来生态文明

社会应该自觉做到:为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而生产,不诱使人们更多地消费;保护自然生命支撑体系,尊重自然资源的极限,为后代的需要着想;做决策时,既不能忽视人们短期的需要,又要考虑长期的社会的、生态的需求;尽可能以电能来替代化石燃料;培育人们协作、共享、互惠以及为邻居和社区负责等方面的品质和文化;给予人类潜能全面发展的机会;真正地实现民主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决策,以满足地方、地区和跨地区的需要。由此,生态文明社会在每一个方面都是反对资本主义的。

复旦大学的王凤才教授从文明形态角度阐述了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问题。他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梳理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混沌型的原始文明,对应人类远古时代或原始社会。这一阶段,神话自然观占统治地位,它把自然神化。第二阶段是经验型的农业文明,对应人类古代社会,有机论自然观占统治地位,它把自然人化。第三阶段是理性型的工业文明,对应工业革命以来的近现代社会,或称工业社会,征服论自然观占统治地位,它把自然物化。

北京大学徐春副教授重点讨论了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当前面对的发展困境源于压缩式发展方式和粗放式发展方式,前者使得不同阶段问题集中出现,后者使得资源环境难以为继。走出困境的途径是实现跨越式发展和依靠内在式发展,前者意味着走生态文明道路来完成工业化进程,后者要求寻找符合中国国情的特色道路。最后,徐春指出,在建设中国的生态文明时应注意层次性和阶段性,以人为本建构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着眼点。

最后,学者们还围绕生态文明与现代性、发展或人口增长等关系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责任编辑 孔伟]